

三掌湖大的“胡子”传奇

向敬之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宏开学府，济济沧沧。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华与实兮并茂，兰与芷兮齐芳。楚材蔚起，奋志安攘。振我民族，扬我国光。”

这首承载着千年文化和现代荣光的歌词，即1933年确定并沿用至今的《湖南大学校歌》（萧友梅作曲）。这一年，是胡庶华首任湖大校长的第二年，歌词便出自这位三掌湖大的传奇校长之手。

“每任一职，三年必辞”的湖大校长

胡庶华早年考取公费留德，在柏林工业大学冶金系专攻钢铁冶金工程，取得钢铁冶金工程师学位。这是德国注重工科实践能力的一种学位制度，是德国人在柏林获此学位第一人。

1922年，胡庶华从德国回长沙，被在岳麓书院办学的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聘为教授兼事务主任。直到他1932年首次执掌湖南大学前，已在武昌大学、同济大学积累了三四年的国立大学校长管理经验。

胡庶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衣着朴素，黑长胡须陪衬一张笑脸，但行事雷厉风行，他到湖南大学后立即恢复矿冶工程系，秉持千年学府传承的经世致用精神，在全国邀请一批矿冶名家来校任教，对学生强调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倡与矿冶企业交流合作，把湖南大学建设成全国钢铁冶金人才培养的重镇。

在哲学上，胡庶华邀请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到湖大作学术报告，让曾留学美国哈佛的理学院院长杨卓新同杜威开展学术辩论。这应该是国际学界名人，首次来到湖南大学考察交流。

他接受矿冶系教授钟伯谦提议，邀请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来湖南解决湘江煤矿地质结构难题。不幸的是，丁文江在谭家山煤矿考察时，因煤气中毒昏倒，抢救不及，英年早逝。胡庶华在湖大静一堂主持追悼会，国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到会致悼词，并将丁文江墓葬于岳麓山，今日还有不少前人前往献花祭拜。

此后，胡庶华把办学重点放在服务社会经济建设上。1930年，胡庶华曾与工商部长孔祥熙等筹建中国工商管理协会（即中国科学管理学会），参与主持第一次全国工商会议。他在协会组织的演讲会上，对上海企业家作《工厂管理之科学化》报告。文史专家许康教授评价他是这一领域“最早的领军人物”。

1934年暑假，胡庶华在湖大积极筹办了中国经济学社第11届学术年会。这是全国经济学界最具权威的学术研讨会，此前只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或沿海工商业城市举行。这次破天荒地进入湖南，也是胡庶华的全国影响力所致。马寅初等全国一流经济学家，纷纷来到长沙参会。

在胡庶华的领导下，湖南大学高度重视这一顶级盛会，全员参与。商学院系主任吴德培在会上宣读了3篇论

文，为提交论文最多者。湖南大学成立了中国经济学社长沙分社，胡庶华任社长。

胡庶华前后三次任湖大校长，历时10年。而前两届，任期皆为3年。这是他的一大显著的个人特征。陶旅枫、彭新卫编著的《明德人轶事》中称他“是位极有个性的人物，最突出的特点是他坚持一个原则：每任一职，三年必辞。因此，他虽然做了七任，可每任一次校长，三年期满必辞职”。

为湖大改归国立殚精竭虑

胡庶华重视道德情操教育，他创作的校歌歌词，倡导“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强调大学教育要以中国特色为根基，学习世界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到“振我民族，扬我国光”。

胡庶华在1932年11月提出“忠孝廉节，整齐严肃”，于次年5月被定为湖大校训。《湖南省立湖南大学二十二年度览》中有一处胡庶华的解释：“余承乏本校之始，即与同人谋所以发扬民族固有之精神者，爰于一一七次校务会议议决，以宋朱晦庵先生所书‘忠孝廉节’、清欧阳亮章先生所书‘整齐严肃’为校训。盖两公先后讲学于此，所题八字石刻，至今犹嵌正厅两虎间，实为本校历史上之瑰宝。”

胡氏校训一直沿用至2000年。新时期湖大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师生们公选“实事求是，敢为人先”作为新校训。校训更替，胡庶华倡导的集句式校训原文，迄今仍置放在岳麓书院讲堂两侧。

胡庶华在任时，还积极谋划湖南大学改归国立。

1932年10月30日，蒋介石、宋美龄到长沙视察，胡庶华闻讯后，邀请他们来湖大讲话，但蒋介石对湖大升格国立，一度持保留态度。

1936年1月23日，胡庶华函请辞职，黄士衡继任校长。国府召集全国大专院校学生代表赴南京聆训，湖大三人抵京面谒教育部长王世杰，表达改归国立的必要，王世杰说：“湖南大学改为国立，前胡校长曾数度计商，略有头绪。”

是年4月26日，时为行政院长的蒋介石再度莅湘，湖南教育厅长朱经农重提旧事，蒋介石说：“湖大改归国立甚善，最好能与清华合并。”当时国立清华已在长沙左家垅兴建校舍，第二年抗

战全面爆发后南迁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是蒋介石在开空头支票，甚至有意将湖大并入清华。1905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的朱经农当即反对，称两校历史关系不同，不便合并。蒋介石勉强承诺：“湖大改归国立，教育部正在考虑，俟返京后与王部长等商妥决定。”

这为一年后湖大实现夙愿，加快了推进力度。此前胡庶华殚精竭虑的革创之功，亦不可没。

在湖大形成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容

1943年，胡庶华调任三青团副书记。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主任委员李毓尧接任湖大校长，破坏校内地下党组织，大肆使用办学经费收买少数同学，监视进步学生的言行，停止一切正常社团活动，指使学生围攻批评校政的教授，开除一大批进步师生……倒行逆施，激发众怒，广大师生爆发一场“驱李护校”运动。

据当时就读于湖大、亲历“驱李护校”运动的胡筠烈士之子李荣光后来回忆：李毓尧勾结国民党宪兵团逮捕进步学生，“除病逝的2位同学外，46位同学在芷江被关押3个多月后，有10人因病保外就医，其余36人于1944年9月，被送往集中营——从上饶、衡阳转迁来洪江的战时青年训导团衡阳分团部。它是全国5大集中营之一”。

1944年冬，胡庶华来到洪江集中营，青年学子遭迫害的经历和惨景令他痛心不已。他返回重庆，欣然接受了教育部长朱家骅要他重任湖大校长的任命状，第二年元月来到辰溪湖大校区，第一时间宣布进步学生无罪，要求受到各种处理的全体同学回校复学，并出面保释被关押了5个月的、与地下党紧密联系的经济系学生汪诤白等。

抗战胜利后，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岳地区受降典礼在岳麓山湖大校区举行。湖大本部校区经历了日军的多轮轰炸与长沙四次大会战的炮火，几近废墟。中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仅存四根爱奥尼克石柱，湖南省内公共建筑规模最大的科学馆被毁坏2/3，学生宿舍毁坏3栋，残存者也是败壁残垣，“全校精华，付之一炬，物质损失”。

胡庶华此前于1940至1943年第二次担任湖大校长时，就坚定地提出“于艰苦中谋恢复，于安定中求进步”，一直是湖大西迁路上的一种倔强的精

神。此次接掌湖大，全国抗战进入大反攻。他更是做了大量工作，将西迁的湖大复校，重建战火毁坏的岳麓山校园，扩大办学规模，建成拥有文法理工商5个学院、20个系的综合性大学。同时，接收了从江苏迁至乾城所里（今湘西吉首）的全国唯一的国立商学院，和商学系合组新的湖南大学商学院。

在胡庶华重新接管湖大的第二年5月，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成立，至他1949年6月离职时，党员已发展到192人。他支持进步组织人民世纪社为骨干的学生自治会，创办《湖大学生》《三日新闻》，开办农场和民校，建立话剧团、歌剧团和评剧团，开展一系列宣传进步思想的文艺活动。

1947年夏，内战继续扩大，国统区危机四伏，民不聊生，不同阶层群体掀起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华北学联发出在6月2日总罢课的号召，湖大学生组织在中共湖南工委的部署下，发动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开展反内战运动。湖南省府严密防范，多方阻挠，派出大量军警封锁湘江，断绝30里水陆交通，甚至派出军队包围学校，禁止学生出校门。

胡庶华指导学生与反动派斗智斗勇，全部过江。年过花甲、长髯飘飘的他，徒步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警告省府官员：“我的学生游行队伍出发了，谁要杀害我一个学生，我就要在省府门前自杀。”

他顶着白色恐怖，先后邀请中共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李达、著名工运领袖罗章龙（改名罗仲言）来校执教，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说。共产党党员朱剑农、萧杰五等教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在校讲授土地经济学课程，配合地下党发挥进步的作用，得到了胡庶华的默许。

在胡庶华支持下，湖南大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教师阵容。

1949年初，胡庶华接受学生自治会请求，吸收学生代表参加应变组织，确定国立湖大决不迁往台湾的原则，保证了几个月后完整无损地转到人民手中。

国共和谈破裂后，胡庶华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毅然离职，抵达香港，参加在港立法委员发起的和平运动，与黄绍竑、龙云等44人发表联名通电《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被蒋介石开除其国民党籍，将其列入通缉“黑名单”。

不久，他重返内地，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冶金工业部专员，并在新建的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前身）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摘抄了大量矿冶资料，拟打出多种专著和论文提纲，为新中国钢铁工业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真知灼见。

国家新生，胡庶华满怀欢欣，赋诗咏怀：“少年虚度老来忙！”他曾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于1961年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遗憾的是，胡庶华于1968年6月17日逝世，终年82岁。10年后，北京钢铁学院落实政策，刊印文章悼念：“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耿直正派，平易近人，一直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作者系长沙市作协副主席，单位：湖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马叙伦诗悼孙中山

顾燕

1902年，17岁的马叙伦来到了上海，经常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文章，使该报带上了革命色彩，风行一时。

当时的上海，革命党人的活动频繁。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活动，经常通过革命党人在日本出版的刊物介绍进来。马叙伦读了很多进步书刊，尤其是读了日本人著的《孙逸仙》一书，对他的触动很大。马叙伦明白，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才能推翻清政府。

在后来的一些事情上，身在广州的孙中山与处在北京的马叙伦做到了同声相应。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由于穷兵黩武，内战频频，致使政府各部门经费支绌，尤以教育经费更为拮据。1919年冬，北京大中小60多所公立学校教职员发起“索薪”运动，马叙伦被北京大学、北京高师和医专公选为教职员会主席，并担任北京大学以及上各高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亲赴北洋政府国务院交涉。1921年3月，北京高校

又发生“索薪”运动，马叙伦依然是领导者。同年6月3日，马叙伦等人赴徐世昌的总统府第三次“索薪”时，还遭总统府马队袭击，马叙伦头部受重伤。马叙伦在《马叙伦自述》中写道：“六三事件的规模，不下于五四运动，它是有革命意义的运动……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也给我们正式的援助，北京的军阀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

1924年年底，孙中山为了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扶病至京。马叙伦对孙中山此行抱有极大希望，于是前往车站迎接。路上，见青年学生络绎不绝涌向车站，市民也挤向正阳门前迎接。民心所向，让马叙伦大为感动。

第二年，孙中山不幸逝世，马叙伦悲痛万分，赋七律一首以悼念：

先生毕竟是人豪，天下为公字字敲。
思想每随时代进，坚贞不为大风挠。
奔走卅年余薄产，缠绵一病返天曹。
使公今日犹操国，郭李勋名未足高。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梁启超用心助人

张雨

梁启超既广闻博学，又善于助人。他有“世界第一之博学家”的美誉。梁实秋曾叹道：“像先生（梁启超）这样，有学问，有文采，又热心肠的学者，求之当世能有几人？”这里所说的“热心肠”，赞叹的就是梁启超乐于助人。

1925年，周传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研究院，成为梁启超的学生。周传儒虽然有令人羡慕的成绩，但因家境穷困，时时陷入窘迫之中。

一次，梁启超与几个学生谈心，了解同学们的情况。一个学生说：“周传儒用课余时间给一所中学代课。他家很穷，他除了挣自己所需的费用外，还要接济家中弟妹的读书费用，确实不易。”

梁启超若有所思，他把这个叫周传儒学生的事故放在了心上。一天下课后，梁启超叫住了正要离开周传儒，问道：“你能不能去松坡图书馆帮忙编制目录？我看你平日整理的课堂笔记很好，你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所以请你帮这个忙。”周传儒听后一脸欣喜，点头答应了。

梁启超明明是在帮助周传儒，但

只字不提帮助，反而说请周传儒帮助自己，因为当时梁启超也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梁启超就这样用心维护着周传儒的自尊心。一个月后，梁启超付给周传儒50银圆的报酬，并赞道：“你整理得非常好，图书馆需要你这样的人长期整理目录，每月50银圆，你愿意继续做吗？”周传儒受宠若惊，满心欢喜地答应了。

因为图书馆给的报酬很高，又方便自己学习，周传儒再不去中学代课了，他实现了“财务自由”，可以安心地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开始周传儒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梁启超觉得他收入不多，生活困难，于是托同学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让周传儒在暨南大学当上了副教授，一年后升为教授。后来，周传儒在学术上取得骄人的成就，成为著名历史学家。人们给予周传儒种种赞誉，周传儒感慨道：是梁先生成就了自我。

类似这样给予学生帮助的事还有许多，梁启超的用心帮助，既保全了家境贫困学生的自尊，又帮助他们摆脱了困境。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陶行知写打油诗

吴吴军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平生为人正直，语言幽默，而且还擅长写打油诗。他写的打油诗，俗中有雅，雅中有俗，说理透彻，十分耐读。

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时，和胡适是同乡。有一次，陶行知读到了胡适写的《我们走那条路》一文，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谈到当时的中国有五个“鬼”，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大社会现象，却没有说到当时在中国横行霸道的帝国主义这个最大的“鬼”。

读了胡适的这篇文章之后，陶行知感慨很多，觉得胡适的文章写得并不完美。于是，他立即写了一首打油诗给胡适，真诚而明确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漏洞。

陶行知的这首打油诗写道：
明于考古，昧于如今，
捉住五个小鬼，
放走了一个大妖精。
这首打油诗既肯定了胡适文章的

优点，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最大的不足，非常巧妙，非常诚恳，而且立场和观点也非常鲜明，很有说服力，能让人在微笑中乐于接受。

陶行知和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交情深厚，是好朋友。翦伯赞喜欢抽香烟，而陶行知却不喜欢，所以，当别人赠给陶行知香烟时，他常常将香烟转赠给翦伯赞。

有一次，一位美国朋友送给陶行知一支好香烟，陶行知用纸将这支香烟小心翼翼地包好，让人送给翦伯赞。翦伯赞打开纸包，不仅看到了香烟，还看到了陶行知附上的一首打油诗。这首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
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年。
陶行知用通俗简洁的语言，轻松幽默地表达了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问候，以及希望翦伯赞能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更大成绩的殷切期待之意。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冰心“三寄小读者”

王剑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燕京大学求学的冰心，迅速投入时代的洪流，开始发表开风气之先的“微型诗歌”。这种融入母爱、童真和自然等元素的新文体，就是后来被大家津津乐道的“冰心体”。

1923年，冰心赴美留学。她把自己旅途中的经历、在异国的生活，以及对家乡和亲人的思念，用温柔亲切的笔调，写成了29封寄给小读者的书信，连续发表在《北京晨报》文艺副刊的“儿童世界”栏目。这些通讯，写的不仅仅是“爱的教育故事”，也详细记录了冰心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其中有对父爱、母爱的歌颂，也有对异国风光和大自然的赞美。

1926年5月，《寄小读者》一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冰心题写书名，丰子恺创作了封面图画。此书一投入市场，立即销售一空。一年之间，再版4次。《寄小读者》是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之作，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小读者。

1942年冬天，迁往重庆的冰心，

断断续续写了4篇给小朋友的通讯。新中国成立后，冰心又写了10多篇新的通讯，她把这组新的通讯题名为“再寄小读者”。这些通讯主要是向小朋友们介绍新中国的变化，激励小朋友们热爱祖国，学好本领，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生活。与20年前的“寄小读者”相比，“再寄小读者”多了一些哲理感悟和励志意味，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新中国的欢欣、赞美和自豪感。

20世纪70年代末，年届80高龄的冰心又写出10篇“三寄小读者”通讯，表达了对新一代少年儿童的爱与期望。这些通讯亲切、平和、热忱，充分体现了冰心一贯的爱心和责任感。这些通讯，在上海的《儿童时代》杂志陆续发表，1981年7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合集。

冰心坦言：“这些寄小读者的通讯，是写得最自由、最率真和最快乐的。”郁达夫称赞冰心：“她散文的清新，文字的经典，思想的纯洁，在中国作家中算是独一无二的。”魏巍也认为：“冰心的光芒，将永远留在几代人的心里。”

谷文昌的“计较”与“不计较”

王厚明

几十年来，每逢春节、清明，“先祭公公，后祭祖宗”成为福建东山百姓们至今未变的习俗。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当年的县委书记谷文昌永远活在了百姓心中，收获了最深沉的怀念？

来到谷文昌干部学院异地学习交流，重温谷文昌的事迹，仿佛在与一个平凡而伟大的灵魂对话。在谷文昌感动天地的荒岛治沙造林之外，从他计较与不计较的些许侧面中，也仿佛找到了真实答案。

计较增加人民负担。20世纪50年代，东山县委买了一辆旧汽车。谷文昌交代秘书：“车子出门要登记，不管是谁，无三不入门。”然而，不可能总会凑齐3个人，因此谷文昌难

得坐车出门。谷文昌总是骑一辆自行车下乡调查、劳动，他说：“还是单车用起来方便，和群众容易搭话。”

1962年，经过十余年的治沙造林，几乎累垮的谷文昌被上级强令去漳州检查身体。通讯员陈耀水陪着谷文昌到了漳州接待处登记住宿时，按规定谷文昌可以住有卫生间的房间，但听说住一个晚上要10元时，谷文昌连连摆手说，何必住这么贵的房间，不能增加东山人民的负担！于是两人找到一家很差的旅社，住一晚每人只要1元2角。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谷文昌以百姓心为心，真情关心百姓疾苦，时刻把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从来从不侵民利、不享私利。谷文昌计较的是，一粥一饭，每一个铜板都来之不易，在生活和待遇上挥霍浪费，就是加重人民的负担，对群众劳动汗水的亵渎。

谷文昌在龙溪地区任职时，由于物资匮乏，买啥都得凭票，儿子谷豫东在高中同学总惠下以父亲的名义买了烟。谷文昌得知此事后，不仅狠狠地训斥了儿子，还领着他到小卖部向阿姨道歉，检讨自己没教好。谷文昌向子女进一步明确了家规：不允许借公家一点油，不允许沾自己一点光。

谷文昌在东山当“一把手”，无论是正常的招工升职，还是上学参军，谷家人一律“先人后己”；大半辈子与林业管理打交道，从不沾公家一寸木材……谷文昌计较的是自己和家里人、身边人搞一点特殊、享一点特权，侵占公家一插好处、损害集体一丝利益。他深知，思想上无尘不染，行动上才能一身正气。

1969年，谷文昌全家被下放到宁化。妻子觉得委屈，谷文昌则说，当初南下时，我们的目的就是解放全中国、为人民服务，个人受点委屈算得了什

么？女儿谷哲慧面对家庭境遇也心灰意冷，对加入组织心怀顾虑，谷文昌得知后，耐心开导女儿：“一个人不能没有信念……不能因为受了委屈，就丧失信念。”1976年，小儿子谷豫东高中毕业，按照政策规定可以享受留城的待遇，但谷文昌不顾儿子的不解和委屈，坚持把他送到偏远的朱坑知青点下乡。

谷文昌妻子史英萍是南下干部，1952年转薪时定为行政18级，每次遇到提拔、晋级、调工资时，谷文昌就首先反对。他还多次对妻子说：“不要计较职务与工资，和群众相比，咱们的生活水平已经很高了。”32年的工作中，史英萍的职务、工资级别都没有提升过。1964年，谷文昌调到福州任林业厅副厅长，有关部门提出可以将当临时工的女儿谷哲慧转为正式工，随父亲一起去省城。不料，谷文昌坚决不同意，他说：“组织上调的是我，不是我女儿。”后来谷哲慧的多次转正机会，都被谷文昌叫停，直到15年后才成为正式员工。

“不带私心干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谷文昌用权以廉、持身以正，不追逐名利，不享受特权，从不计较职务与待遇，用雷打不动的清廉“标配”和公仆本色矗立了一座精神丰碑。